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分工合作：民国文史研究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实践

姜 萌

JRUCWP2026029

2026. 04. 03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 分工合作： 民国文史研究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实践

姜 萌

**[摘要]** 由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方式、评价体系等内容构成的学术研究组织形式是影响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传统“四部之学”在清末民初时期向现代“七科之学”转变，由“分科”而“分工”的意识初步产生。在分科治学不断深化的20世纪20年代，面对庞大复杂的“国故”，胡适、梁启超等人正式提出了“分工合作”的理念。分工合作是清末以来分科治学理念深化和科系制深入发展的结果。分工合作能将学人有效组织起来，能让资源发挥最大效果，能让学术机构高效运转，又尊重了学人的学术兴趣，切实推进了民国文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分工合作的最佳载体是同人学术，典型代表是史语所、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等。分工合作在知识论层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认识论层面并未达到预期。民国时期的“分工合作”虽是特定情势的产物，但对当前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有可借鉴发扬处。

**[关键词]** 学术研究组织形式；分科治学；分工合作；民国文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 引言

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既离不开研究者的天赋与努力，也离不开外部组织的协调与促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研究者刻苦努力发挥天赋的前提下，学术研究能否不断进步，知识生产能否提质增效，主要取决于学术研究组织协调水平。简要地说，由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方式、评价体系等内容构成的学术研究组织形式，是影响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优化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组织形式，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水平，激发研究者潜能，是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发力点。这一工作的开展需要较好把握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组织形式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但当前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主要侧重于观念、思想、方法等方面的考察，对该问题关注还不多。<sup>①</sup>

**作者：**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jiangmeng@ruc.edu.cn。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社科基金项目（25XNN013）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文责自负。

<sup>①</sup> 一些研究已经对相关问题略有所涉及，如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新星出版社，2007）、《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姜萌《从“新史学”到“新汉学”——清末民初文史之学发展历程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刘超《走向“大大学”和“大科学”：中国高等教育及知识系统变革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等。但这些均不是正面贯通的研究。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众多学科和领域，各学科领域的研究特点和发展历程有一定差别。本文选取民国时期的文史研究组织形式为研究对象，以图管中窥豹。民国时期文史研究组织形式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分工合作”。政治动荡、战乱不断，民国现代文史研究仍能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学术界分工合作的良好运行。虽然“分工合作”见诸民国时期各种文献中，但是它是如何形成的、具体实践情形和效果等，并不清晰。本文拟在梳理其发展历程、分析实践情形基础上，总结其利弊得失，以期有益于当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作。

### 一、从分科到分工：民国文史研究组织展开的逻辑递进

民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分工合作”，是中国学术受西方现代学术分科治学影响的产物。在清末“七科之学”意识出现并落实到现代教育和学术体制建构时，就因“分科”而产生了初阶的“分工”意识。<sup>①</sup>早在1896年动议举办京师大学堂时，就初步确立仿造西方分科治学的思路。负责此事的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复奏中指出，“非添筹经费，分科立学不为功”，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sup>②</sup>1901年刘坤一与张之洞为新政肇画的“江楚会奏三折”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借鉴国外教育经验规划的高等学校学制，目标就是“习专门之学”，故“参酌东西学制，分为七专门”。<sup>③</sup>这为之后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分科的基调。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并将大学堂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8门。章程还列出了各分科大学应学习的基本“科目”，比如政法科有“各国理财史”“各国政治史”“中国历代行律考”等，文学科“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有“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中国古今外交史”“泰西各国史”等，商科有“商业历史”等。<sup>④</sup>虽然这个章程主要是规定大学堂建设思路和教学课程设置，但“分科—分工”的逻辑已初步可见。作为整体的“知识”，被分割成了不同的“科”与“目”。

针对分科大学及内部科目设立，王国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文学科大学应该包括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其中经学科、理学科应设“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等课程，史学科应设“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等课程，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应设“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等课程。<sup>⑤</sup>王国维此时对西方学术有较多观察和思考，他提出的建议，是对“分科”与“分工”的深化。其中提及的“中国史”“哲学史”“文学史”等概念，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学术体系的支撑性概念。

清末设立分科大学堂及授课科目的设计，虽然还没有深入到学术研究组织层次，却为之后中国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组织的展开提供了体制机制的发展方向。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建设和学术发展正是在这个方向上不断精细化而成。民国肇建，针对停办北京大学堂的声音，严复坚决反对。他指出“高等大学所以养专门之人才”“无专门则庶功无由克举”，即使暂时聘请不到优秀师资，“各科自为研究，探赜索隐，教思无穷”，也能“自重其国教化之价值也”。<sup>⑥</sup>他吸收了之前王国维等人的意见，针对文科大学提出改良办法，计划将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舆地各门”。<sup>⑦</sup>蔡元培1917年接掌北大后，借鉴德国大学经验对北大继续进行改良，以“学”与“术”分离及避免科系与他校

<sup>①</sup>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194-20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sup>②</sup> 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224-22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sup>③</sup> 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4、8叶，光绪辛丑两湖书院刊本。

<sup>④</sup> 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348-38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sup>⑤</sup>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教育世界》，1906（119）。

<sup>⑥</sup> 严复：《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载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11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sup>⑦</sup> 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载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12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重复的思路,计划保留文理两科并将其适当扩张,将法、医、农、工、商科并入其他学校。<sup>①</sup>陶英惠指出,这体现了蔡元培注重学术互助与合作的精神,“好处是在学术上分工合作,各有专长,可免雷同”。<sup>②</sup>蔡元培还向教育部申请将之前隶属国务院的国史馆归并到北大,并成立北大史学门。北大史学门成立的学术史意义在于,“文、史两科的分离才得以比较彻底的实现”。<sup>③</sup>

在现实各种因素牵制下,蔡元培最终将北大学科缩减归并为文、理、法三科。文科有哲学、中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和史学6门,理科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地质学4门,法科有政治、经济、法律3门。<sup>④</sup>从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发展,但并不是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架构。因为他虽然以“分工合作”为思路来改良大学,但是也比较清晰地意识到“文理分科之流弊”。他认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文科学生如果“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而“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理科学生如果“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而有一些学科,如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文理交错之处甚多,不能简单划分到文科或理科。<sup>⑤</sup>蔡元培对这一流弊的认识颇有道理,但却难以提出有效解决办法。实际上,这至今仍是中國高等教育和学术组织工作无法克服的难题。

这一问题的本质是“通”与“专”的根本性冲突。从原理上说,学术作为人类真实世界的意识反映,确实是一个整体,各个学科彼此相连,不能绝对割裂。从理想上说,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不能自我设限,应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学”为最高鹄的。这两点使蔡元培在改良北大时有“防弊”意识。但是,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只有“分科”到位才能促进管理的“层级化”与“条块化”发展。从学术和专业建设的角度,只有“分科”推动的“层级化”和“条块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专业化”建设才有空间。梁启超曾言:

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sup>⑥</sup>

“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的观念,<sup>⑦</sup>或许有可商榷处。但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尚未建立之际,进一步追求分科是必然大势。换言之,此时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建设的“分科”进程还没阶段性完成,蔡元培的“防弊”意识及措施并不能被人充分理解及彻底实行。这一改制方案公布后,引起了校内外一些讨论。在哲学门求学的傅斯年就公开反对将哲学门划归文科。傅斯年受科学主义影响,认为现代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文史或可不必分,但是哲学与文、史一起归入文科,流弊很大。傅斯年也认识到了哲学与文、理两科皆有联系的特性,因此建议在文理科外,设一哲学科。<sup>⑧</sup>

综合内外情况和意见,蔡元培在1919年对北大体制改革进行深化,废止文、理、法三科,改用科系制度,设立中国文学、哲学、史学、数学、物理学等14个科系,并对课程进行更新完善。<sup>⑨</sup>此举目的在于“融通文理两科界限,期得完全明确之精深学术,专为养成学者起见”,<sup>⑩</sup>实际上是

① 《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载《新青年》,1917,3(6)。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5)。

③ 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④ 静观:《北京大学之最近学制》,载《申报》,1919-10-11。

⑤ 蔡元培口述,黄世晖记:《蔡子民先生传略》,11-12页,商务印书馆,1943。

⑥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231页,商务印书馆,1930。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46页,商务印书馆,1922。

⑧ 傅斯年:《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载《北京大学日刊》222,1918-10-08。

⑨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⑩ 静观:《国立北京大学之内容》,载《东方杂志》,1919,16(3)。

顺应文、史、哲等学科的独立意识。正如刘龙心指出的那样，“在细致的学科分化之下，文学、史学及哲学都在寻求自身的独立意识，以确立学科之间此疆彼界的划定，20世纪的学术发展即是以此为基调”。<sup>①</sup> 这一论断解释了为什么科系制的实施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至此，以西方学科为导引的“分科”问题基本完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组织有了相对现代的体制依托。虽然在蔡元培的理念中，专业科系主要承担的是学生培养职责，但是专业科系才是聘任专任教师的依托机构。只有有了以“专深学问”为聘任标准的专任教师，以学术研究为职责的研究机构或学人集群才可能出现。北大的科系制落实后，研究所的计划才得以落实和发展，学术研究的“分工合作”才有了体制依托。

从另一视角看，“分工”的深化又促进了“分科”的完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就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sup>②</sup> 蔡元培借鉴德国等欧洲大学经验，计划成立各专门研究所。1918年初，蔡元培就计划在北大设立国文、英文、哲学等9个研究所。但是该计划最终没能实现。科系制实施后，北大将研究所设立计划收缩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和国学4个。<sup>③</sup> 国学研究所于1921年11月率先正式成立，由沈兼士担任主任。国学研究所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入研究所的学生“请本校教授讲师分任指导”。<sup>④</sup> 国学门研究所的组织设置，是从“分科”到“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陈以爱指出：“北大研究所之设立，乃是建立在中国知识界中日益高涨的、对设立研究机构之呼吁上”。<sup>⑤</sup> 这种呼吁只是主观的动力，客观的动力还是分科治学和促进中国文史之学走向科学化：

本学门之设立，其研究以文字为范围而不以学科者。盖吾国学术界向来缺少分科观念，在未经整理以前，不易遽行分科而治，故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旧学，为将来分科之预备，非专己守残，以为可与他种科学分驰也。<sup>⑥</sup>

国学门成立后，内部组织还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研究室是属于研究所的正式机构，但是学人们的研究兴趣和议题不一，以研究目标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群也应运而生。国学门研究所内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又分别组织了歌谣研究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等细化分工的组织，其性质就是学术研究群。从《国学季刊》各期刊登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记事》可知，这些研究室和学会都迅速在各方向展开了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

北大科系制的实践和研究所的建设，对中国各大学的发展产生了示范性影响。此后中国大学的建设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推进。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校等。所不同的是各学校情况有异，对发展重点略有调整。这一思路至今还在延续。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成熟有学院化、专业化和独立化三个标准。<sup>⑦</sup> 如果说北大科系制的建设和研究所国学门的组织发展，有力促进了学院化和独立化进程，那么专业化主要是通过具体研究的“分工合作”实现的。

## 二、“力少而成效大”：民国学人关于“分工合作”的基本认识

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史研究有三个主要特征：知识系统发生质变，基本走出经学时代“四部

①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121页，新星出版社，2007。

② 《大学校长蔡子民就职之演说》，载《东方杂志》，1917，14（4）。

③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5）。

④ 《研究所国学门重要记事》，载《国学季刊》，1923，1（1）。

⑤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6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⑥ 《研究所国学门启事》，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年）》，14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⑦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221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之学”的笼罩，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学科门类与知识系统基础上，确立了现代学科意识和分科发展思路；学术导向和学术机构快速更新，“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共同作用，兼容并蓄，中西结合，推动中国文史研究从传统经验主义向现代科学主义快速转变；<sup>①</sup> 学术研究走向职业化，文史研究不再是传统学人自由散漫的个人兴趣式研究，或“老病消愁送日之具”，<sup>②</sup> 而是以专业学术机构为依托、以专业素养为基础的终生事业。当这三个方面都发展到一定程度，如何高效组织学人开展研究成为当务之急。梁启超、胡适、丁文江等既有很强个人研究能力，又具有国际视野，还肩负学术研究组织责任的学人们，综合西方经验、本国国情、学人学术兴趣等因素，普遍认为只有分工合作才能将中国学人有效组织起来，让资源发挥最大效果，让学术机构高效运转，切实推进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发展。为什么学人们普遍认可分工合作呢？

首先是任务重，合理的分工可以开展更多研究。此时研究者们面临的时代任务是“就中国各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sup>③</sup>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已经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们意识到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有所作为。比较早表达这种认识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结尾部分指出：

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sup>④</sup>

天才烂漫的梁启超，学术方面最大的志向就是撰写一部新史观指导的中国通史。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绪论》至此，已逾二十年。此时正值又一次努力即将中辍的困境，分工合作的倡议可谓是发自内心。稍后胡适也表达了类似的认识：“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sup>⑤</sup> 当中国学者初步掌握了“科学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国故”整理工作时，面对悠远历史、浩瀚史料和纷繁史迹，压迫感、急迫感油然而生，分工合作就成了共识。

这种认识不仅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较为普遍，可以说是一直贯穿民国。1922年成立的北大史学读书会，出发点就是考虑到“吾国史材宏多，散无纲纪，非分代整理汇为通史，或分科精研各成专史，实不足以有济”，因此希望通过成立读书会“广求同志”，使具有不同才能的同学“聚合一堂，各出所学”，推动中国现代史学快速发展。<sup>⑥</sup> 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北大史学读书会并未实现目标。同一时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学和地学方向的师生也成立了史地学会，“共谋联结，倡导风气，分工合力，协志以赴”。<sup>⑦</sup> 1927年5月，在清华国学院读书的姚名达等人发起清华大学史学会，也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清华大学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sup>⑧</sup> 该年底，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尝试以“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创中国学术的新世界。这项工作的入手之方，就是分工合作：“语言历

① 姜萌：《“由旧入新”与“无中生有”：民国初年的文史之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4）。

②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2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③ 刘复：《敦煌掇琐叙目》，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1（3）。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55页，商务印书馆，1922。

⑤ 《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1923，1（1）。

⑥ 《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附简章）》，载《北京大学日刊》1004，1922-04-19。

⑦ 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载《史地学报》，1923，2（3）。

⑧ 姚名达：《哀余断忆》，载《国学月报》，1927，2（8、9、10期合刊）。

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sup>①</sup>在此后的社会史研究、考古学研究等领域，还有不少学者倡议“分工合作”。此处不再赘述。其实希望分工合作的不仅仅是文史之学。现代民族学的开创者杨成志也说，现代人类学或民族学的范围和研究对象特别广大，绝非任何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所能透彻一切，“必须联合各位专家分工合作从事专题的研究，这样去干，才可以希望得到相当的收获”！<sup>②</sup>

其次是资源少，顺畅的合作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取得更大研究成效。清末民国时期，国家历经磨难，积贫积弱，能够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经费等资源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人自为战是不合理的，“分工合作，则用力少而成效大”。<sup>③</sup>当时饱含爱国热情的学术研究者 and 组织者们，总是想着如何少花钱多办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说，分工合作可以避免重复冲突，“免于浪费精力和物力”。<sup>④</sup>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表达得更明确：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不但是要使得各种有常轨的任务做得切实精确，而且要利用他特殊的地位，使得做这种工作的机关，互相联络，互相援助，一切的工作合理化，合作化，可以以最少数的经费来做大量的任务。<sup>⑤</sup>

对蔡元培和丁文江来说，国民政府每年拨给中央研究院 120 万元的经费，是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必须发挥最大的效果。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三周年时也说，“以前的学术界不懂得分工”，导致“一条路上挤着无数人，却空了许多条路没有人走”，而且“人自为战，白耗费许多精力”，学术的进步非常迟缓。<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学术研究，也是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克服困难逐步展开的。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达延安后，无论是党的理论建设还是党员干部教育都需要尽快展开历史研究。毛泽东同志在 1938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六次全体会议做政治报告时，专门指出了历史学习和研究对于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⑦</sup>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正在努力克服物资匮乏、资料缺少和研究人员不足等困难，推动相关研究开展。1938 年 5 月，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1941 年 7 月，该院改建为马列研究院，并设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思想等 9 个研究室。其中历史研究室下设近代史、农民土地、民族三个组，首要任务就是以分工合作的方式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马列研究院的改建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是落实该年 5 月份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的措施。毛泽东同志 1941 年 5 月 19 日在延安干部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之前党中央研究历史的号召效果不太好，“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他认为这是“极坏的作风”表现之一，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sup>⑧</sup>

“分工合作”共识形成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工合作”。从民国学者相关阐述来看，中国

① 《发刊词》，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1（1）。

② 杨成志：《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载《更生评论》，1938，3（4）。

③ 秦佩珩：《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载《新经济》（西安），1944，11（3）。

④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载《中央周报》，1935（387、388期合刊）。

⑤ 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载《东方杂志》，1935，32（2）。

⑥ 顾颉刚：《纪念辞》，载《禹贡》，1937，7（1、2、3合期）。

⑦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533-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⑧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797-802页，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现代文史研究的分工合作是从主题、时间和空间三个方向展开的。以研究主题将一个庞大研究对象划分成多个小的研究范围，本质上是“分科”意识的产物。因此这一方向出现的也最早。早在清末时期，借鉴西方学术理念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工的尝试已经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师培 1905 年撰写的《周末学术史序》，将学术史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等 16 类。曾受此文影响的黎锦熙在 1936 年指出，刘师培该篇“分科举证，容有可商”，但其提出的治学门径已经“不废江河万古流”。<sup>①</sup>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分科”即将完成，“分工”必须展开，梁启超、胡适都提出了以主题为思路进行分工的方案。两人的思路比较接近，都是尝试先将庞大复杂的中国历史按照主题划分成各个专门史，然后在“专门史”获得较好研究基础上升华成反映历史整体进程的“文化史”。梁启超在 1921 年讲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初步谈到应该将历史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而专门史是指“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sup>②</sup> 此时他对于“分工”可能只是初步有个想法，所以只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应该探索重视的 22 个问题，其余并未展开论述。直到 1926 年讲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氏才集中笔墨去阐释“研究专史如何下手”。<sup>③</sup>

从“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始，胡适就在倡导以科学方法对“国故”进行系统整理。胡适所谓“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专史式的整理”。早在 1919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就将哲学史分为“通史”和“专史”。“专史”有四类：“专治一个时代的”“专治一个学派的”“专讲一人的学术说的”“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sup>④</sup> 这应是“专史式的整理”意识的萌芽。1921 年，他在东南大学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时虽然提出了“系统的研究”，但还没有正式提出“专史式的整理”。他只是指出“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sup>⑤</sup> 到 1923 年执笔《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胡适将“系统的整理”丰富为“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三个部分。他认为“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要做成这样一部理想的文化史，至少要包括 10 个部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胡适还指出，“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sup>⑥</sup> 仅仅从文字就不难看出，胡适上述对“专史式的整理”系统论述，有其多年的思考积累。他对分工的理解，从“主题”拓展至时间和空间。比较难看出的是，胡适这 10 个方面的“专门史”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举的 22 个问题在内容上有比较高的相关性。

此一时期思考如何“分工合作”的还有朱希祖和一些青年学生。北大学生在 1922 年发起史学读书会时，明确主张对中国历史“宜分代分科，各精探讨，散之则各启疆宇，合之则互输材料”。<sup>⑦</sup> 对于同学们的这种主张，此时执掌北大历史学系的朱希祖是赞同的。他在 1922 年底北大史学会成立演讲中指出，虽然鲁宾逊等西方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割裂空间和时间，但是按照空间、时间和主题进行“分割”，是切实展开研究的必然路径。他对史学会的希望是“我们最好把中国历代的史，分割开来，各人分任去研究，将来综合起来，就可以成一部精详的中国史”。他在演讲中还指出，

① 黎锦熙：《序》，载《刘申叔先生遗书》，宁武南氏刻印本，1936。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54 页，商务印书馆，1922。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 页，商务印书馆，1930。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6 版），2-3 页，商务印书馆，1920。

⑤ 胡适讲，枕薪记：《研究国故的方法》，载《东方杂志》，1921，18（16）。

⑥ 《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1923，1（1）。

⑦ 《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附简章）》，载《北京大学日刊》1004，1922-04-19。

北大史学系的课程，主要是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按照主题、空间和时间进行分割的，各课程合在一起，就是连续的。<sup>①</sup>

从胡适、朱希祖等人的阐述可知，伴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入和科系制的发展完善，“分工合作”已经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体制和机制。“该不该分”与“如何分”已经初步解决，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研究如何“下手”。梁启超在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在清华学校讲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系统阐述“研究专史如何下手”。梁启超认为“专史”可以分为5项：“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sup>②</sup>他在设定“专史”时，基本思路也是综合了主题、时间和空间等因素。这或许是受到了胡适、朱希祖等人的影响。他在论述各专史做法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在论述中尽可能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这是对他之前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回调；二是“事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阙如，反映了才学识如梁启超，在“专史”划分和实践上仍然有很大的困难。

学术研究正是在批判、吸收、继承和探索中不断前行。胡适、朱希祖、梁启超等人关于文史研究如何分工合作的讨论，形塑了延续至今的断代史、区域史和专题史。他们在“专史”理论思考遇到的困难，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史研究实践的展开而进一步解决。

### 三、同人学术：分工合作的最佳载体

何谓分工合作？按照丁文江、李济等研究者和组织者的理解，就是科学知识的取得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有一群受过实际训练的人作基础工作”，“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组织，作一个神经中枢，负安排调度的责任”，合理分工，避免重复，充分发挥研究资源效能。<sup>③</sup>分而论之，“分工合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从研究人员来说，均由受过科学研究训练的专业研究者担任某一方面的研究任务，即从“通人之学”转变为“专家之学”；<sup>④</sup>从资源配置机制来说，建立专业的学术机构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资源的争取者、掌握者和配置者；<sup>⑤</sup>从学术评价来说，专业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专著成为主要评价依据，<sup>⑥</sup>“科学准绳”成为学术评价的核心标准。<sup>⑦</sup>上述三项切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真正既能“分”又能“合”，看起来容易，实则难度极大。第一项涉及到专业资格的认定标准，第二项涉及到资源分配的公平，第三项涉及到学术评价及其由此产生的待遇差异。三项中有一项处理不好，分工合作就不可能平稳开展。纵观民国学术发展，这三项能够较好处理，分工合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离不开民国独有的“同人学术”。

“同人学术”的实质就是“学术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民国时期虽然还没有“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学人们却有相当清晰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意识。由于民国学人使用最多的概念是“同人”或“同志”，因此将其称为“同人学术”。早在1918年，还在读书的傅斯年就将“中国学

<sup>①</sup> 《朱逸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载《北京大学日刊》1116，1922-11-24。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3页，商务印书馆，1930。

<sup>③</sup> 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载张光直编：《李济文集》第5卷，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sup>④</sup>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153-15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sup>⑤</sup>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69-7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sup>⑥</sup> 民国教育部1914年8月规定“论文或著述之提出，应以对于各该科有系统之研究，且有心得者为限。日记、讲义录、课本等不在论文或著述之列”（《学术评定委员会分科评定规程》，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5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918年3月公布的《学术审定会条例》对“学术之著述及发明”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学术审定会条例》，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561-5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sup>⑦</sup> 姜萌：《“古音辨”与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10）。

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 (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第4条“基本误谬”进行猛烈批评。<sup>①</sup> 在傅斯年等人看来，学术研究真正要展开，需要将志同道合的学术研究者汇聚在一起，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学术主题展开研究。借用康白情的话就是：“集合同志，系统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共赴一定的目的，以期有所贡献于社会”。<sup>②</sup> 南高史地研究会称“同人等问学旨趣，偏此二学，心痛现状，爰布兹册，将以求正有道，希助友声，以共阐前古之积绪，而期今后之精进”。<sup>③</sup> 傅斯年在创办史语所时的思路就是：“确定旨趣，以为祈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sup>④</sup> 朱光潜也曾指出，“学问像其他事业一样，需要分工合作的地方甚多”，研究者如能够顺畅地开展分工合作，“会有很浓厚而愉快的群的意识”，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能尽量发挥群的力量，才能尽量发挥个人的力量”。<sup>⑤</sup>

综合上述阐述可知，“同人学术”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学人有相对接近的专业能力和共同接受的学术评价标准，二是学人有接近的学术志向、观念和方法，三是有一个协作的机构，最好还有一个能发布同人学术成果的刊物。其实还有一个隐形条件，也是最关键的条件，就是有一到两位能够为同人拥戴的学术组织者。民国文史哲等学科的专业化建设之路，在“分科—分工”导向下呈现出清晰的“同人学术”倾向，多数机构完全或基本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以下结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史学机构发展情况略作阐述。可以说，这些机构成就显著之时，基本都呈现出“同人学术”倾向，民国时期具有“同人学术”色彩的史学研究机构有三大类：一是国立性质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史学系；一是私立性质（含教会大学）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史学系；一是学人自发凝聚的民间学术组织。

第一类最成功的研究机构无疑是史语所。傅斯年在史语所创立时就强调只聘用志同道合的同志，以“集众的工作”形式进行“有规模的系统研究”。<sup>⑥</sup> 傅斯年不仅设计好了分工的方向（专业组），还规划执行了殷墟考古发掘、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各省方言调查等大型学术研究计划，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学术成就。杜维运曾评价说：“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sup>⑦</sup> 史语所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就在于傅斯年以身作则，倾尽全力将其打造成了一个学术志向明确、运行规范高效的学术共同体。从1928年创所始，傅斯年一直执掌史语所至1950年去世。长期协助傅斯年管理史语所的董作宾说傅斯年将建设史语所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是他报效国家的一途”，“二十三年如一日”，“切实负责，事必躬亲，不避危难，努力以赴”。<sup>⑧</sup> 王泛森指出他“采用铁腕手段来管理这个研究所，坚决地将他的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者”，并尽力为史语所寻找各种资源以确保研究项目能够顺利展开。<sup>⑨</sup> 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史语所仍沿着既定道路发展。此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张政烺回忆说：

史语所始终坚持初创时的办所方针，视学术工作为自己的职责，继续组织人员开拓史料来源，整理和刊布鲜为人知的新史料和方言调查报告。同时著名学者写出一批史学和语言学的论

①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新青年》，1918，4（4）。

② 康白情：《团结论》，载《少年中国》，1922，3（9）。

③ 《编辑要则（旨趣及门类）》，载《史地学报》，1922，1（3）。

④ 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第1册，215页，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8。

⑤ 朱光潜：《处群的训练》，载《中央周刊》，1942，4（32）。

⑥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1）。

⑦ 杜维运：《傅孟真与中国的新史学》，载《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⑧ 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载《大陆杂志》，1951，2（1）。

⑨ 王泛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92-10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着，造就和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在史学界和语言学界起着带头作用。<sup>①</sup>

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机构是以陶孟和为领导，以汤象龙、梁方仲为核心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组）。这个所是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发展而来，核心人物长期稳定，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保持着稳定，坚定在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方向努力。汤象龙、梁方仲等人“企图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建立‘一时代、一方面的历史’”。<sup>②</sup>实践证明，他们确实“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联合体’，对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和形成作出了十分重要的乃至关键的贡献”。<sup>③</sup>除了上述两个机构，其他还有顾颉刚负责时期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蒋廷黻负责时期的清华大学史学系、朱希祖负责时期的中央大学史学系、朱谦之负责时期的中山大学史学系等。

第二类最成功的应该是洪业、顾颉刚领导的燕京大学史学系和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洪业在1924年出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和历史系主任后，不仅将历史系的教学与研究方向调整为中、西历史并重，并且努力延聘顾颉刚、邓之诚、钱穆等高水平学者来任教。<sup>④</sup>洪业在学术组织上最用心也是最有成就的工作是1930年在燕京大学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洪业自述，他从1930年“招集几位同志”尝试探索中国书籍引得的编纂方法，重点是探索引得“编纂之分工合作”方法并编纂出“简而备，疏而不漏”的引得。<sup>⑤</sup>引得处在洪业领导下，“把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重新校刊，用现代眼光加以诂评，并编以引得（索引）”“在中国研究古籍的学术上创立了新纪元”。<sup>⑥</sup>根据洪业弟子翁独健、王钟翰的统计，洪业主持引得编纂处二十多年间，“先后编纂、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多达64种81册”。<sup>⑦</sup>曾参与引得编纂处工作的王钟翰总结引得编纂处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有钱、有人、有责”：洪业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大力支持，获得了一笔稳定经费，专款专用；除了洪业一直担任引得编纂处的主任外，聂崇歧和李书春等人长期担任他的助手；洪业知人善任，编纂处人员合理分工，责任明确，全力以赴。<sup>⑧</sup>洪业领导的引得编纂处成就斐然，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不仅所编引得“行销于外国者甚多，而西方汉学家对之尤为重视”，且洪业也因为“主办引得事务获得法兰西铭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之一九三七年度茹理安奖金（Prix Stanislas Julien）”。<sup>⑨</sup>除了燕京大学史学系和引得编纂处，民国时期私立史学研究机构或史学系具有同人学术色彩的还有陈垣领导的辅仁大学史学系和贝德士领导的金陵大学史学系等。

民间学术组织方面，最成功的是顾颉刚领导的禹贡学会和陶希圣领导的食货学会。创办禹贡学会的顾颉刚希望“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用“合作的精神”在中国地理沿革史领域“痛下一番功夫”。<sup>⑩</sup>禹贡学会以《禹贡》半月刊为阵地，“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sup>⑪</sup>核心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是顾颉刚及其学生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在历史地理沿革、边疆史地、地图绘制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创办三周年时骄傲

① 张政娘：《我在史语所的十年》，载《张政娘文史论集》，533页，中华书局，2004。

② 刘龙心：《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2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③ 梁承邨：《梁方仲学术评价实录：〈无悔是书生〉续篇》，1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

④ 查时杰：《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1919—1952）》，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20）。

⑤ 洪业：《引得说》，载《引得》特刊之四，35—37页，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2。

⑥ 陈毓贤：《洪业传》，191页，商务印书馆，2013。

⑦ 翁独健、王钟翰：《洪煨莲先生传略》，载《文献》，1981（4）。

⑧ 王钟翰：《洪煨莲师与引得编纂处》，327—340页，载王钟翰：《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

⑨ 容媛：《引得编纂处十年概况》，载《燕京学报》，1940（28）。按：茹理安奖金即儒莲奖。

⑩ 《发刊词》，载《禹贡》，1934，1（1）。

⑪ 《禹贡学会简章》，载《禹贡》，1935，4（3）。

地说,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们聚在一起进行分工合作式的研究,“是最有力的推进学术的方法”!<sup>①</sup>

同时期的食货学会,也做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食货学会用于“联络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食货》半月刊除了刊发成果外,还“报告各方面研究工作的消息,使大家可以彼此明了,办到分工合作的好处”。<sup>②</sup>陶希圣在1934年创办《食货》杂志提倡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明确号召朋友们分工合作,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材料与问题进行认真地搜集和研究。随后他以《食货学会本年六项工作草约》为题阐述了“分时分地”的主张。<sup>③</sup>食货学会的领导者是陶希圣,核心人员是及其学生全汉升、杨联升等。他们以《食货》半月刊为阵地,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为己任,各司其职,不仅尽可能从正史、地方志中搜集资料,介绍外国论着,还按照分时分地原则开展了专门研究。食货学会成果相当丰硕,“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sup>④</sup>与禹贡学会、食货学会类似的机构还有吴晗、汤象龙、梁方仲、张荫麟、罗尔纲、夏鼐等人组成的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卫聚贤、吴稚晖、叶恭绰等人发起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等。

如果说“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目标为民国时期的学人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的话,那么以“同人学术”为载体的“分工合作”,则提供了比较适宜有效的组织保障。正是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才有效克服了资金不足和战争动乱等不利因素,让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得以起航并初步赢得了世界学术同行的尊敬。

### 余论：分工合作的成就与限度

分工合作实际上包含了“分”与“合”两个层面。纵览民国文史研究学术实践效果,大概呈现这种特点:分工基本完成,合作比较顺畅,但是“分”层面取得的成就大于“合”层面取得的成就。进一步言,在知识论层面,研究者从主题、时间和空间三个角度将中国的“文史”划分成很多个具体领域,以实证研究为基本工具,展开了系统梳理,取得了显着成就。但是从知识论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合”,即将无数个具体“知识”聚沙成塔工作并未达到预期。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不仅有特殊的主客观因素,也是“分工合作”自身特点决定的。

“分”之所以能够取得显着成效有其独特的主客观因素。主观方面:一是普遍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学术研究者和组织者使命感非常强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二是学术共同体意识让国家、机构和个人研究兴趣可以有机结合,内部分工合作大多可以落到实处,机构之间亦能形成比较合理的竞争与合作;三是特殊时代造就了独特的学术领袖,这些领袖可以令人信服地引领方向、合理分工、评价学术等;四是学术领袖在学人聘评方面有很大话语权,被聘请者与解聘者基本可以平和接受,有利于同人机构打造。客观方面:一是现代学术研究刚刚兴起,学术领域几乎一片空白,研究者建功立业相对容易;二是学术研究者人数比较少,职业地位高、待遇厚,几乎没有职称评审、人才项目评聘等个人利益竞争;三是人事制度尚未绵密,相对松散的人事管理环境既可以让学者在全国可以自由流动,也可以让学术领袖长期经营一个机构(如傅斯年一直担任史语所所长、洪业长期领导引得编纂处等);四是知识论层面的材料发现、整理、辨析,以实证研究为主,确实适合划分成一个个细小的领域进行精耕细作。

① 顾颉刚:《纪念辞》,载《禹贡》,1937,7(1、2、3合期)。

② 长江:《陶希圣与〈食货〉》,载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学家学记》,7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③ 陶希圣:《食货学会本年六项工作草约》,载《食货》,1935,1(6)。

④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97-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合”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也有其独特的主客观因素。主观方面，最主要的因素是在“分”未充分展开之前，对“合”的认识还停留在想象层面。梳理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分工合作的阐述可知，普遍有一种只要“分”成功了，将各个专门史拼在一起，就是成功的“合”。譬如梁启超说：“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sup>①</sup>再如胡适认为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先要“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sup>②</sup>高耘晖在讨论社会史研究分工时认为：“专题的分类研究，易于精深而条贯，成功较速，各人研究一方面，将来各人都有了成绩，合拢来就是一部社会史”。<sup>③</sup>用各专门史拼合成中国通史，或用各专题研究拼合成专门通史，这固然也是一种思路，但很难做到认识论层面的“通古今之变”。只是叠加知识并不能完成智慧升华。换言之，认识论层面的融会贯通，很难分工合作。客观方面，认识论层面的“合”确实要以知识论层面的“分”为基础。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史研究刚刚起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以科学精神为指导，以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几千年积累的繁杂混沌的材料进行科学梳理辨析。这项工作后来因为抗战爆发等原因颇受影响。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证研究在大陆学界又大规模展开三四十年，实证研究才在各领域完成阶段性任务。“碎”与“通”的讨论也由此生发。

当前中国学术界正在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坚实的学术史研究为基础。我们只有系统准确地了解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来时路，才能更明确努力方向。民国文史研究分工合作这种组织形式的形成虽然有其独特时代因素，但是对于今天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特别是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学科评估等方式来加强学术共同体的打造，增强学术研究单位的内部凝聚力，形成学术研究合力，有利于解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分散化、碎片化问题。另外，在已经高度量化、竞争化和精细化的今天，分工合作的精神仍然需要继承。

##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The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Republican China

JIANG Meng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academic research, composed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s, work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our Categories of Learning” to the “Seven Disciplines of Learning” gave rise to an initial awareness of “disciplinary divis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1920s, as the specialization of disciplines deepened, scholars such as Hu Shi and Liang Qichao formal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the vast and complex body of “national heritag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represented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ization of disciplin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sulting from the deepening of departmental systems. It also respected scholars’ academic interests and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organized scholars, maximized re-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2页，商务印书馆，1930。

② 《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1923，1（1）。

③ 高耘晖：《分工研究的方法》，载《食货》，1935，2（2）。

source utilization,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significantly advanc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The ideal vehicle for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was collaborative scholarship, with prominent examples includi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HP),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the Yǔgòng Society (禹贡学会) and the Shíhuò Society (食货学会). Whil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e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t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Although the practice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was a product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t still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oday.

**Key words:**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Academic Research, Specialized Study,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Republica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